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年第 6 期 (总第 239 期)

语言转向与对文学的再认知

汪正龙

摘 要: 20 世纪人文科学中的语言转向,革新了文学观念,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认知。古老的模仿论或再现论受到动摇,语言的自足性受到重视。由于重视语言的自我表现性,文学游戏论以一种复杂的形态再度复兴。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则从语言转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中获得灵感,重构自己的知识形态。

关键词: 模仿论;游戏;文学;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9142(2017)06 - 0148 - 05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语言转向,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的现象学 - 存在主义 - 解释学,以及罗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共同推动了这个转向。虽然说结构语言学对 20 世纪文学理论特别是形式主义批评影响深远,但是现象学 - 存在主义 - 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关于语言的思考对文学理论也事关重大。语言转向更新了文学观念,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认知。本文从模仿或再现论的衰微、文学游戏论的复兴以及大"文学"和大"叙事"观念的形成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一、模仿、再现论的衰微

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古老的模仿论、再现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式走向了衰微。可以说,结构语言学、现象学 - 存在主义 - 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共同促成了这一进程。

在索绪尔那里,语言被视为各个组成要素以及这些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把语言归结为纯形式性和关系性,冲击了先前再现论的语言观。在受之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家眼里,文学创作被视为语言行为。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把艺术归结为技巧和程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进一步认为,"动词'写作'变成完全不及物的行为,作家不再是写某物的人,而只是写作而已"①。文学的真实不再被认为是关于现实的陈述,而更多地被理解为旨在产生某种现实或逼真效果(verisimilitude)的幻觉结构或表现手法,"对于真

收稿日期:2017 - 08 - 30

作者简介:汪正龙,男,安徽南陵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23)

① Roland Barthes, "To Write: Intransitive Verb?" in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41.

实,话语不负任何责任:最现实主义的小说,其中的所指物毫无'现实性'可言……(现实主义文论中)所谓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①,"叙事作品不表现,它不摹仿。……叙事作品中'发生的事情',从指物的(现实的)角度来看,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②。德里达干脆主张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决不存在对事物本身的描绘,这首先是因为根本不存在事物本身"③。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在反对模仿论或再现论方面与形式主义各派及解构批评方面颇为一致。海德格尔直言他的艺术存在论反对的是"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④。他在分析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诗《冬夜》时指出,这首诗"没有表现出某时某地的某个真实冬夜。它既没有单纯地描绘某个已经在场的冬夜,也不想为某个不在场的冬夜创造一个在场的假象和印象。……众所周知,一首诗歌就是创造"⑤。他认为诗是一种纯粹的被言说。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了"异域感"(l'exotisme)的问题,即认为艺术与世界存在着一种既关联又疏离的关系,"即便是最现实主义的艺术,都传达着被表现的客体的这种异质性,虽然它们其实都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艺术将它们赤裸裸地呈现给我们。……绘画的形式和色彩并没有掩饰什么,而是揭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正是由于形式和色彩保住了事物的外在性。现实,依然与作为被给予之物的世界格格不入。这样一来,艺术作品在模仿自然的同时也尽可能地远离自然。这也是为什么任何属于过去世界的、陈旧的、古老的事物都能产生审美效果的原因"⑥。

分析哲学家、美学家古德曼(Nelson Goodman)也认为,世界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而哲学、科学、艺术是构造世界的不同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不仅仅是用其字面上所言说的东西构造出来的,而且也包括其言说的隐喻意义。并且,也不仅仅是用其字面上或隐喻地说出来的东西构造的,也包括其所例证或表达的东西——与所言说的东西一样,也是由其显示的东西构造的"⑦。

这里涉及到在语言转向背景下对文学语言的自足性以及文学语言自反性或元文学维度的自我认知。众所周知,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把世界分为三个:物理状态的世界为第一世界,精神状态的世界为第二世界,科学、艺术的世界为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或世界三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可以脱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个说法实际上彰显了语言所构筑的世界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语言转向特别是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人们对语言的建构潜能的认识,也推动了文学的自我反思。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就说:"语言的觉醒对于文学行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使作家没有受到抽象反思的诱惑,文学自身总是拥有一个元文学的维度(metaliterary dimension)。"⑧

二、文学游戏论的复兴

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文学语言的自我表现性受到重视,20世纪文学理论出现了康德以来文学游戏论的再度复兴。这里面涉及的情况非常复杂。大体来说,受结构语言学影响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在首肯文学的人文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承认文学的游戏性。同样受结构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游戏论则更为推崇文学语言的自指性。而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游戏论虽然涉及文学艺术,但却是在各自的哲学思维框架中提出来的,与生命形式及人的生存相关联。

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新批评,从语言表现力方面探讨了文学游戏现象,如语音游戏(如谐音双关、叠字等)和语义游戏(如意象重组等),但是程度不同地顾及到文学与经验世界及

① 【法】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② [法]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1页。着重号系原文所有。

③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④ [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⑤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页。

⑥ [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⑦ [美]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姬志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⑧ T. Todorov, *Introduction to Poe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xxi.

社会价值系统的关系，尚未把文学归结为纯粹的语言游戏。俄国形式主义者埃亨鲍姆注意到文学与过剩精力的关系，“艺术的最初本性，只要求利用人的机体中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或只在其中得到部分的和单方面的利用的能量。这就是艺术的生物学的基础，它使艺术具有寻求满足的生活需要的力量。这个基础实际上是游戏性的，并不与固定的‘意义’相联系，它体现在‘无意义’、‘作为目的本身的’倾向之中……这就组成了作为社会现象和作为特殊类型的‘语言’的艺术”①。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诗歌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意识的背反，这种背反中就包含了语词与意象的游戏成分。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也认为文学包含了游戏的因素，但认为“将诗歌降低成一种游戏，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产生审美快感，这种结论至少是不全面的”②。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也承认诗歌的机智与反讽中包含有游戏的成分，又认为“机智的诗人看待事物的态度不能仅仅只是‘游戏’”③，“诗歌更讲究逻辑上的完整性，它远不止是一个设想可比附性的游戏”④。

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把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任意性的思想推向极端，认为文学与外在世界和人类经验无关，而成为语言的自主游戏，一种能指的狂欢。他们从语言建构潜能方面突显文学的游戏本性，实际更为看重的是文学语言的自指性。罗兰·巴特认为：在文学写作中，文学一个能指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专注于语言本身，所指无限后退，不仅作者从属于写作的符号功能，因而成为文本游戏的一部分，“如果他是一位小说家……他不再有特权的、父亲式的、真理－神学性的地位，而是无足轻重的游戏”。而且文本、阅读也是游戏，“在这里，‘游戏’应该尽可能广义地加以理解：文本自身在游戏（就像一道门，就像一个机器，在这里有游戏）。读者是二度游戏：他‘玩’文本（在游戏的意义上），他寻求一种再生产文本的实践”⑤。巴特眼中文学活动的整体便成为游戏。在巴特所看重的追求写作快乐的“可写性文本”中，“整体语言结构碎了……让自身迷上次等终极性的游戏：魅力，展示，对立，话语，炫耀，等等”⑥。福柯也说：“写作的展开就像一种游戏，它不可避免地遵循自己的规则，最后又把这些规则抛开。因此，这类写作从根本上说不是揭示与创作活动有关的情感或者让主体进入语言。毋宁说，它主要关注的是创造一种让写作主体源源不断地消失的开启。”⑦德里达则提出了文字的“延异”（différence）概念，“将每一赋意过程看作为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那也是一种踪迹的形式游戏”。能指对所指的表达关系总是被超越，在相互参照的文本网络中，文本变化中的每一术语都由另一术语的踪迹来标识，所假定的意义内在性也已经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响。因此，德里达“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结”⑧。在德里达那里，写作成为单纯的语言活动，一种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多地由能指本身的性质所支配。文学语言的陈述过程成为一种空的过程，是多种写作相互对话、相互戏仿、相互争执而成。这事实上将文学当作一种单纯的文字游戏，解除了文学的价值负载。

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即应用一定规则的陈述，并认为“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⑨，将语言游戏和人的活动和生活形式联系起来。这个说法显然适用于文学。而海德格尔则较早从语言的编码和解

① ［俄］埃亨鲍姆：《文学与电影》，转引自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② J. Mukarovsky, “Poetic Reference”, in *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e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77, p. 160.

③ Cleanth Brooks, *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8.

④ ［美］兰色姆：《新批评》，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⑤ ［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钱翰译，见《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2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159页。

⑥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译文略有改动。

⑦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6.

⑧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册，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4页。

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15页。

码的角度涉及游戏，“消息与传信的隐蔽关系无处不在游戏”①。他还多次谈到运用语言所进行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世界化的映射游戏。物是四重整体的聚集，在这自由的四方域中，每一方与其他方互相依偎，得其自在。② 在海德格尔看来，唯有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可见，海德格尔是把语言乃至艺术作为人的最根本的栖居方式之一。列维纳斯进一步把艺术的游戏与闲暇相联系，“那些心灵僵化，把赴音乐会看成一项任务的成年人之所以会感到无聊至死，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不懂得享受纯粹的游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游戏在高于努力的层面上进行。在此层面上，我们的努力和努力的目标被截然分开，我们可以享受这种努力中不受利益驱动的，不求回报的特点”③。德国解释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有生命的生物能够在自身中具有运动的动力，自行运动是一般有生命之物的基本特性。游戏便是一种自行运动，它并不谋求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而是生命存在的自我表现。他认为把艺术游戏同语言游戏相联系，能使人更容易地按照游戏模式去考虑我们世界经验的普遍语言性，“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但游戏活动与严肃东西有一种特有的本质关联”④。从上述的观点看，文学作为语言游戏，便具有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多重意义，与人类的自我延伸和自我扩张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文学活动视为游戏活动，那么此游戏不能仅仅归结为语言问题，而应当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相关联。康德曾经说过：文学作为想象力的幻相的自由游戏，是由知性的合目的性来调控的，“诗艺用它随意产生的幻相做游戏，但不是以此来欺骗；因为它把自己的工作本身就解释为单纯的游戏，尽管这游戏也能被知性所用，合目的地运用到它的事务上”⑤。这样看来，或许把语言视野和其他多种视野综合起来理解文学游戏问题，才更为稳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在这方面的尝试因而值得特别注意。

三、走向大“文学”与大“叙事”

语言转向重构了文学的性质与含义，从而重新界定了文学的疆界。一方面，语言转向对文学自身的属性如语言的建构功能和文本的陈述形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使我们对文学具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话语分析又被引入文学研究之中，进一步揭示了文学言语、陈述与理解的共生特征。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则从语言学转向视野下关于游戏、叙事、隐喻、虚构、反讽等的讨论中获得了启示，试图从文学研究中寻找革新本学科基础、构筑新的知识形态的契机。正如卡勒（Jonathan D. Culler）所说：“当文学不知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陷入从所未有的困惑时，失去自信的人文科学，却对文学生产的潜在前景感兴趣……试图从文学中汲取‘复杂性的范例’和‘独特性的范例’。”⑥

在反本质主义思潮高涨的语境下，文学作为书写被认为天然是反本质主义的。德里达认为：“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⑦这样看来，文学性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特定时代人们特定方式的感知物。不仅狭义的美文学，而且其他的语言书写形态也可能具有文学性。德里达进而指出：文学作为“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能够“唤起民主、最大程度的民主”⑧。文学语言的建构能力甚至架起了文学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的桥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为整合与重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灵感与路径，重视文本内部研究和内部规律的纯文学观演变为主张文学性共存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大“文学”观，叙事也由文学的陈述机制演变为存在于多学科和多文化的共同机制，成为大“叙事”。

①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4页。
② 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8－190页。
③ ［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⑤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⑥ ［美］卡勒：《文学性》，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史忠义、田庆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⑦ ［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⑧ ［法］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eorg Iggers）说："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科学相联系着的。"① 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在诸如历史编纂学、文学批评和哲学（它们是现时代人文学科的主干）这些领域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与形式问题或再现问题有关，而与材料（题材）或方法论（研究步骤）问题没有多少关系。"②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在今天，'细读'的观念已经替代了先前的'科学方法'观念。文学崇拜替代了科学崇拜。"③至此，一种融合了诗性、想象力和同情等质素的大文学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蔓延开来。按照卡勒的说法，"文学……成为众多话语的一种特性，既包含文学性—叙事、修辞、述行性可以用流传至今的文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又包括文学价值，即那些经常在非文学材料的文学阅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如具体性、生动性、直观性和似是而非的复杂性"④。

同样，叙事的观念也波及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成为大叙事。从哲学上说，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提出"宏大叙事"的概念，指社会政治历史中具有主题性、目的性和完满性的设想，并指出，只要科学研究"希望自己的陈述是真理，只要它无法依靠自身使这种真理合法化，那么借助叙事就是不可避免的"⑤。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暗示了历史事件和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⑥。以色列心理学家利布里奇（Amia Lieblich）等的《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把叙事视为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重在对叙事材料及其意义的研究，"做群体间的比较分析。了解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一段历史，探究个性等"⑦。美国教育学者克兰迪宁（D. Jean Clandinin）主编的《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探讨了叙事作为社会素材的加工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构造，引导个体的生活方向，在塑造或绘制人一生的自我认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⑧ 叙述甚至被赋予人类学意义，成为保存记忆、倾听与理解他人进而认识自我并拓展自我的一种方式。因而我们可以说，语言转向不仅更新了文学观念，推进了对文学的认识，同时也启迪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本学科的知识生成路径，反过来增进了对文学的认知。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A Rethinking of Literature

WANG Zheng-long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humani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reforms the literary ideas and changes our cognition toward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al mimesis or representation theory is destabilized while the self-sufficiency of language is valued. The literary theory of language games revives in a complicated form due to the valuation of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Variou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inspired by literary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reconstruct their knowledge formation.

Key words: mimesis; game; literature; narrative

（责任编辑：素微）

①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 页。
②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5 页。
③ ［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48 页。译文略有改动。
④ 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
⑤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60 页。
⑥ ［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版，第 95－96 页。
⑦ ［以］利布里奇：《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王红艳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 页。
⑧ 参见［美］克兰迪宁主编：《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鞠玉翠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30－160 页。